

面对艾滋病

2004

Confronting
AIDS



李
楯○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面对艾滋病

2004

Confronting
AIDS

李

楯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对艾滋病 2004/李楠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12

ISBN 7-80190-856-2

I. 面... II. 李... III. 艾滋病-社会问题-研究-中国 IV. D66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0731 号

面对艾滋病 2004

著 者 / 李 楠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址 / <http://www.ssap.com.cn>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65595789

项目经理 / 王 绯

责任编辑 / 童根兴

责任校对 / 易 之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 × 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9.25 字数 / 147 千字

版 次 /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0-856-2/D·259

定 价 / 2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 20 年 回顾（代序）

艾滋病在中国流行的 20 年恰恰在时间上和中国通过改革走向开放的 20 年相重合。疾病没有国界，但疾病的流行和疾病所反映出的社会问题，却因社会的结构、制度、文化传统、人们的价值取向及回应能力而有不同。

20 年来，通过宣传教育，人们得到的关于艾滋病的信息已经相当多了，但一般人对艾滋病的认识却并不清晰，甚至似是而非，原因是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分化为利益、主张各不相同的群体的时候，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就不能不受到这种分化的影响。艾滋病是一个

危及生命，在目前还无法治愈的传染病，但艾滋病又是一个很难被传染上的传染病。在一般情况下，艾滋病毒离开人体很难存活，一个非感染者只有通过和感染者的体液（血液、精液、阴道分泌液等）交换才有可能感染上艾滋病。由于艾滋病的传播常与男同性恋和多性伴的无保护的性行为（包括无保护的商业性行为），及药物依赖者共用针具的吸毒行为相联系，所以有关艾滋病的信息传递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艾滋病被妖魔化了。有关艾滋病的信息传递没有给人们送去理性的认识和自我保护的知识，却制造、传递了恐慌和歧视。其实，艾滋病因输入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使用带有艾滋病毒的血制品而感染的概率是很高的（大于90%），而因无保护（不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感染的概率却相对较低：男传男的概率是1%，男传女的概率是0.05%~0.15%，女传男的概率是0.03%~0.09%；其他，共用针具的概率是0.67%，母婴传播的概率在欧美报告为15%~30%，在非洲报告为30%~50%，职业暴露的概率是0.3%~0.5%。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艾滋病正处在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传播的临界点上”，“人人都有可能得艾滋病”。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医学界提供给我们的有关艾滋病传播途径和自我保护方法的信息

是正确的，那么，相当多的能够自己把握自己，不为不安全性行为和共用针具吸毒行为的人就不会感染上艾滋病——除非政府不负责任，医生不负责任，使这些人在自己无法掌握的情况下，因献血，因不得不在医院接受手术治疗、输血、使用血制品等而感染艾滋病。

自第一例艾滋病报告出现在中国以来，中国的政策回应历经了如下的变化：先是提出要“筑起一道新的长城拒艾滋病于国门之外”，其后是严厉禁娼禁毒，其后是加强血液管理，最后是提出“四免一关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报告数从百余人增至十余万，而推测数则为几十万或百万人。我想如果“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及“四免一关怀”的具体政策能早提出，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当不会像现在这么多。

艾滋病在中国流行的情状和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是有不同的：第一，中国有着别国少有的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人群；第二，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中因性传播的比率不高（截止到2004年9月底累计报告数中，异性传播只占7.9%，即使把吸毒、卖血之外的其他所谓“感染途径不详”者都算作是经性传播，异性传播最大也超不过30%，而全世界感染者中70%以上属异性传播）；第三，艾滋病对中国的

经济影响不明显（医学界有说艾滋病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人民币 4000 亿 ~ 7000 亿元的损失，但缺乏证据证明；另，据称艾滋病使乌干达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 30%，使泰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20%）；第四，一般认为在别国有效的行为干预方法在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下作用有限。

现在，不少人都开始说“艾滋病不只是一种传染病，而且是社会问题”，但我们应进一步思考：是艾滋病成为了社会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造成了艾滋病像今天这样流行。我认为无论是在世界上，还是在中国，情况都属后者。贫困、被边缘化、缺少防病和保健方面的信息沟通和制度化的医疗保障，造成了艾滋病像今天这样流行。世界上的艾滋病感染者 95% 在发展中国家，而中国的感染者大多在农村。

面对艾滋病，我们的价值取向受到检验：我们是因艾滋病危及到人（哪怕是农村人，是性工作者，是吸毒的人）的生命，所以必须重视；还是因艾滋病会影响国家安全、经济增长、社会稳定，才去重视。同样，一个社会重视艾滋病，可以在法治和善治的原则下去做出回应，可以体现出不同境遇、不同生存方式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关爱，也可以是以管住感染者、遏制疾病传播为第一要义，无视感染者和相关人群的尊严和基本权利，采取一系

列强制性和这些人群所不愿接受的措施。在以上两方面，我们的认识正在从后者转向前者。

我们对艾滋病流行势态的认知存在问题：这不在于我们不知道究竟具体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他们是谁，在哪儿？而在于我们对情势的判定不是来自事实，而是受所谓的和“国际”接轨，受形成于计划经济年代的已成定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受地方或者是部门利益的影响；受各种信息垄断的影响。

我们在艾滋病的防治策略和资源配置上也存在问题：我们的政策制定较多受来自外部的“政策开发”影响，而缺少有本国感染者和相关人群的参与。我们在方法上几乎是完全模仿别国的做法，缺少自己的创造。我们的投入产出不合比率，距效益极大化相去甚远，不能做到使有限的投入为更多人分享。

在较早的时候，我们就提出要区分作为疾病的艾滋病和作为问题的艾滋病，作为问题的艾滋病显然不是靠医生和政府的卫生行政管理系统可以解决的。在中国，它有赖于党政系统和公众及国际社会的合作，其中必不可少的是要有感染者及相关人群的参与。只有在一个真正以人为本的相对和谐的社会中，遏制艾滋病传播的上升势态才是可能的。因此，在中国能否较好地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与中国能

否全面地推进改革是呈正相关之势的。

具体而言，在中国能较好地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又有赖于：第一，政府公开信息，并对国民的健康权承担更积极的责任；第二，提供条件，使公众在艾滋病的防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第三，改进法律，使前两项有制度化的保障。

李 楠

2005 年 7 月 28 日

目 录



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 20 年回顾（代序） / 1

迎战 AIDS：人文 - 社会科学家的作用

——中国的经验 / 1

Confronting HIV/AIDS: the Rol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tists

——The Chinese Experience / 49

艾滋病与人权：发展中的问题与转型中的中国 / 119

AIDS and Human Rights: Problems in

Development and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 133

清醒认识艾滋病 / 153

艾滋病的投入产出 / 233

附：

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政策法律和伦理组要报

关于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中有关艾滋病感染者的

规定给人事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的信 / 247

目 录



关于在押人员中艾滋病感染者应否集中关押问题
给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司法部劳动
教养管理局的信 / 254

关于制定中治安管理处罚法可能和现行艾滋病
防治中的行为干预形成法律冲突问题
给卫生部的信 / 268

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政策法律与伦理组
工作制度 / 273

后 记 / 281

迎战 AIDS： 人文 - 社会科学家的作用

——中国的经验^{*}

在这里，谈的既是中国问题，又是中国的一些人文 - 社会科学家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些公共知识分子，自身在参与艾滋病防治的行动中的感受。说这是中国问题，表明这是来自作为多元一体的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经验，也就是说是一种地方的经验；说这是中国的一些从事人文 - 社会科学研究专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在参与艾滋病防治中的感受，则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责

^{*} 本文系作者于 2004 年在泰国世界艾滋病大会上的发言。

任——一种对生命、对人类的责任，一种与终极关怀相关联的思考。

在联合国千年目标中，艾滋病在八项中处第六项。在今天的世界上，人类面临着诸多的问题，而千年目标只有八项。目标的确定体现了一种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目标所关注的，不是一般的国家利益，或者是经济增长，而是人类的发展。艾滋病因其具有一种标识性而列于八项目标之中。由此，使我们感悟到：在这个时代，很少有一种疾病像艾滋病那样使这个世界的几乎是所有的问题都显现出来——使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结构，看清人们的分歧，认识到我们所主张的和实际所做的之间的差距。

当我们将艾滋病问题带入中国时，第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艾滋病作为问题在中国的表现是否有和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之处？中国有着世界少有的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人，中国的异性性行为传播的比率不高，艾滋病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并不明显，行为干预的作用在目前的中国实际上是有限的。

在中国，较长时间或较多地参与艾滋病问题研究的一些人文 - 社会科学家，或者是作为参与艾滋病问题研究的人文 - 社会科学家的整体，显现出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性。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是作

为一般的技术专家或是职业性学者参与艾滋病问题研究的；在与艾滋病相关的研究和行动中，他们具有一种独立性。不依附，不迎合，能够向权势讲真话——不管这权势是自己所处社会传统的主导意识形态、国际的主流话语、掌握项目经费的机构和人，还是公众的看法和情绪。在与艾滋病相关的问题上，他们的主张和行动，体现了他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

一 人文 - 社会科学家参与 艾滋病防治的过程

中国的人文 - 社会科学家对艾滋病的关注始于 1990 年。当时，中国政府的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制订了中国的预防艾滋病中期规划。协和医科大学的张孔来教授请潘绥铭教授（性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一筠教授（社会学家，当时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李楯教授（法学家，社会学家，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专家网络负责人）等参与了与艾滋病相关问题的讨论，并在此后推进了一些相关的研究。1993 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邱仁宗教授就与艾滋病相关的社会、伦理、法律问题发起、召开了多次国际研讨会。今

天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主持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的夏国美教授和民间组织“爱知行”的负责人万延海就是当时会议的参加者。另外，会议使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和医学界，和从事艾滋病治疗的专家建立了最初的联系。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张北川教授、北京佑安医院的徐莲芝教授和潘绥铭教授、李楯教授等之间的合作即始于此时。2001年，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在美国有终身教职的景军教授回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他发起举办了第一届社会科学与艾滋病防治国际研讨会，吸引了中国相当一批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参与了有关艾滋病问题的研究。高耀洁教授、桂希恩教授、张福杰医生、赵红心医生和当时已任职于卫生部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沈洁女士等的参加，使人文－社会科学家和医学界之间的合作更为广泛。由于这次会议是中－英项目支持的，所以它对中－英项目后来的推进也有着相应的影响。2003年，在清华大学举办的 SARS 与 AIDS 国际论坛将人文－社会科学家和医学界，和政府，和国际组织以及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推向了新的阶段。何大一博士在清华大学表示希望和中国参与 AIDS 防治的多种力量建立合作，克林顿和盖茨基金会对这一合作表达了支持的意向。

此后，中国政府在艾滋病问题上的政策有了明

显的改进，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家开始担任政府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面临新的问题。

二 人文-社会科学家在艾滋病防治中所做的工作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家，要用自己学科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对艾滋病问题——特别是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做出解释；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则关注人，关注社会，对人和社会担负着责任——以自己的专业学识和行动回报社会。因此，参与艾滋病防治的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家的工作上实际上包括了三部分内容，这就是：开展研究、服务社会和影响政府。

（一）开展研究

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又体现于三个方面：

1. 调查与经验研究

直接在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之中做调查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翁乃群教授的河南调查、云南调查和清华大学景军教授的河南调查，以及上海社会科学

院的夏国美教授在上海、四川、云南等地所做的调查。相关的研究则有中国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的四川省城郊路边性产业中的艾滋病风险与最佳干预模式研究和庄孔韶教授在西南少数民族中运用民族文化传统推进戒毒的人类学研究。此外，为艾滋病防治提供背景的，有持续十余年的规模巨大的中国流动人口（农民工）研究，社会分层研究和贫困研究，以及中国性状况研究和商业性行为及性工作者人群研究，毒品使用、禁毒法和戒毒研究。

在与艾滋病防治相关的伦理问题上，邱仁宗教授持续进行了十多年的研究。在法律和公共政策方面，李楯教授的工作也已持续数年。近年，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王若涛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薛澜教授和景军教授在这方面也有所投入。在艾滋病的社会经济影响方面，先是北京信息控制研究所的袁建华教授等进行了研究，后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丁宁宁研究员和国务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研究院的丁元竹研究员也有所关注。在艾滋病防治与传媒的关系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卜卫教授和清华大学的李希光教授都有过颇具影响的研究。

2. 发表著述

2000年以后，一批有影响的著述先后发表。其